

新闻媒体不再是我们工作的重心，也不再是人生的全部。而我们原来以为，可以在某个报社、杂志社，工作一辈子，把个人的特长、爱好，兴趣与工作结合，过着宽裕、体面的生活，改变一下世界。

如今，我们不再有类似的幻想。但我们在新闻业的那些年，曾经为这个梦想和目标努力过，付出过汗水和青春。自然，我们现在也谈不上后悔和失望。在一个以5G为代表的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，我们和传统的纸质媒体时代一起老去，傍晚站在山峰上看看红色太阳西沉落山，倒也是不错的经历和体验。

许知远花了六年时间，写了《青年变革者：梁启超1873-1898》。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说：“许知远阅读史料体验那个时代的心情，借助想象重塑那时社会的生活，通过将心比心的感受复活梁启超的生命历程，并尝试着以梁启超式‘笔端常带感情’的写法，写出梁启超和他的时代，也写出中国那一段风云诡谲的历史。”

作家陈冠中看完书说：“只有细说历史才能挽救史观于庸俗，而好的传记则是真历史的不二伴侣，许知远的梁启超传堪称为此做了一次示范，考证到位、文字漂亮、叙事细密、立论严谨，如此厚重讲究的历史人物传记，读来如故事般引人入胜。”

这本新出的书，只是许知远写“梁启超”传记里的第一部。按照他的规划，这本书还有两大本。这意味着许知远下面的五六年时间，将继续书写梁启超的中年和晚年，还有他所处的大时代和大变局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则

互联网对我来说，是新一轮的思想启蒙。我写的《纳斯达克的一代》，实际上是对这种感觉的憧憬。

评价：“人物传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写作者的情感投射，知远的任公传，在知人论世、文字表达、价值认同上，都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，值得期待。”

互联网与中国社会

腾云：《纳斯达克的一代》是我在2000年的时候给你策划出版的，但这本书你从未再版过。你在书中充满热情地书写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中国互联网，并对互联网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充满期待。现在，你怎么看待那个时候的自己？

许知远：很多回忆被勾起了。《纳斯达克的一代》是我出的第二本书，写得非常散乱，充满对于新技术革命带来一种革命性力量的渴望。

我们是一代人，看着媒体兴起和衰落，看着曾经看不上的互联网公司崛起，看着我们渴望追求的价值观、我们表达的那套语汇、那套人文系统，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慢慢瓦解破碎，精神上有很多失落。其实，互联网是造就这种消失的一个重要力量。

回顾90年代，我大学毕业，赶上了当时的互联网风潮。1995年，我们最初上网用“猫”，从14.4K到后来的28.8K，价格贵，上网一小时需要15块钱。那时候，互联网包括其代表的新技术、新文化，对我非常有诱惑力。

我们是读《连线》杂志成长起来的。当时《连线》强调，要成为科技界的《滚石》杂志。当年的年轻人就发现，科技突然变成世界上最酷的东西。比如，当时像雅虎那样很火的公司（而现在这些公司几乎都没有了）的创始人，都变成了流行的数字英雄和偶像，就像如今的优酷、推特一样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互联网出现，对我们是巨大的精神启蒙，硅谷的管理方式、思维模式及其代表的个人精神，让人痴迷和向往。1998年起，我开始读凯文·凯利的文章，一会觉得云山雾罩，一会觉得大开眼界。他把生物、经济、技术，包括摇滚精神，全混在一起进行全新表达，对中国70年代生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。

中国的互联网领域，涌现了如张朝阳、丁磊、王志东、马化腾等

右图：青年梁启超。

